

南康沧桑录

范翔宇

在北海，提起南康镇的沧桑往事，很多人都会拿现存的南康老街的骑楼说事，以此证明南康历史的悠久。因此，南康在人们的笔下，也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笔者多次考证这些故事的起源，但常常劳而无功，于是只好钻进老书旧籍中寻找，好在也偶有所得。常年搜寻，集腋成裘，由此得以从不同的侧面粗知南康历史之一斑。

建制设置说南康

南康，古属石康县，因其位于石康县治之南，故以“南康”称之。由此可知，南康行政区域设置的时间与石康同步，时在宋开宝五年（972年）。南康得名由此算来，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那么，南康在此之前，行政区域归属如何呢？如前所述，南北朝齐政权时期（479年—502年），齐政权划合浦郡一部设盐田郡，盐田郡的郡治，据《壮族通史》的考证是在今北海市区东南，这与南康所处的方位相同，此时的南康地域，不论以何种名称存在，应该都属于盐田郡的管辖范围。

唐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在将合浦郡改为廉州之前，就专门以珠池为名在合浦设县，珠池县的行政区域范围就在今北海市区内。虽然珠池县的建制时间短，至唐贞观十二年（638年）就撤销了，但由此见证了合浦珠池的历史地位。有研究者认为，珠池县的县治在今营盘镇一带，如是说，此时的南康地域，当属珠池县。

石康镇设县的起止时间，从宋开宝五年（972年）至明成化八年（1472年），历宋、元、明三朝，刚好500年。在这500年间，南康隶属石康县的建制没有变更的记录，这是一个相当长的稳定时期。

由于合浦古珠池分布广阔，在史籍中存名的17个（含一池多名）古珠池自东向西分布的海域，东西长约100千米，南北宽约30千米。为了加强对珠池的管理，确保珠池的收获为朝廷和官府所有，历代都对珠池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到了明代，朝廷采取与海寨相结合的办法，即将珠池的管理职责与海防营寨挂钩，

这样一来，既保证了珠池的安全联防，也加强了海防的力量。

明崇祯《廉州府志》中的《珠池篇》所记述珠池的分布较为清楚：“乌泥池，至海猪沙一里，海猪沙至平江池五里，平江池至独揽沙洲八里，独揽沙洲至杨梅池五十里，杨梅池至青婴池十五里，青婴池至断望池五十里，断望池至乌泥池总计一百八十三里。”

《海寨篇》中则记述：“此营堡类也，当人武经志，乃附于此者，为珠池而设也。乌兔寨至凌禄寨五十里，至乌泥池二十里，守军五名；凌禄寨至英罗一十五里，至乌泥池十五里，守军五名；英罗萧村五里，至乌泥池十五里，守军五名；萧村至井村五里，至海猪沙十三里，守军五名。”

专为珠池而设海寨，并建立专职的管理职能部门，这就是珠场巡检司。关于巡检司的职责，《明史·职官志》的定义是：“主缉捕盗贼，盘诘奸伪，凡在外各府州县关津要害处俱设，俾率徭役弓兵，警备不虞”，“特赐敕谕之，寻改为杂职。”

到了清代，巡检司的级别有所降低，处于儒学之后。《清史稿·职官志》中仅记为“掌捕盗贼，诘奸宄，凡州县关津险要则置，隶州厅者专司河防”。也就是说，到了清代，巡检司在县一级关津险要设置的才司“掌捕盗贼，诘（盘查）奸宄”之责，州厅一级的则“专司河防”。由此可知，珠场巡检司是专为珠池缉捕盗贼而设置的。这一措施的出台，也是与当时珠池管理中出现的状况密切相关的。

早在元代，朝廷就设立了采珠提举司，其强化并完善则在明代，采珠钦差内官（太监，也称内侍）派驻珠池由此成为常态。为此，合浦的永安千户防御所城堡和白龙千户所城堡，都被用作采珠公馆驻地。虽然明代朝廷有明文规定：“守珠池中官，诏毋得预守土事。”然而，由于采珠钦差内官直接介入珠池的管理环节，不但权力不受节制，个人贪欲恶性膨胀，更重要的是，地方官府为了迎合这些采珠钦差内官的所好，以致相互勾结，瞒上欺下，荼毒珠民。一些珠民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下，铤而走险，聚集起来到珠池采珠。为了驱逐、镇压聚集到珠池采珠的珠民，官府和采珠钦差内官就将这些珠民为求生而采珠的行为称作“盗珠”，珠民被诬称“珠盗”，因此激化了珠民与官府之间的矛盾，导致强烈的反抗和武

装冲突。在明代的史籍文献中，关于朝廷与“盗珠”“珠盗”行为对抗的记录不绝于文牘。《明实录世宗实录》中有这样的记述：“广东以珠池之役，激穷民为盗，攻劫屠戮，逼近会省，凡此皆有戾天和上千星变者也。请停不急之工，罢采木采珠之令，则彗灭而前星耀矣。”

明万历年间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记述：“珠池之盗，鸣锣击鼓，数百十人荷戈以逞，有司不敢近，然彼以劫掠无赖为生，白手挈蛋人而窃之，多少所不论，皆其利也。若官司开采则得不偿失，万金之珠，非万金之费无以致之。世宗朝尝试采之，当时藩司所用与内库所人，其数具存，可镜矣。盗珠者虽名日禁，实阴与之，与封矿同。不则，此辈行掠海上无宁居，然亦非有司之法所扞也。”

最初，珠场巡检司驻地不是固定的。《读史方輿纪要》中记述：“珠场巡司在府东南六十里。”明清时期，珠场巡检司先后驻南康、白龙城。至于具体地点，目前有史料可查的，就是清康熙初钦差大臣、工部尚书杜臻所著的《粤闽巡视纪略》中的记述：“丙戌行三十里至兵畔村，又十里至珠场寨，明时设兵以防珠盗者也。偕李抚军、张正郎列坐海岸，望海外云山重叠如画，西即白龙城，东为调埠寨。”这段记述虽然简短，却指出了几处与珠场寨相关的地名，明确了珠场寨的位置：珠场寨在兵畔村（今营盘畔彬村）5千米外；珠场寨西即白龙城，东为调埠寨。《廉州府志》中的《海寨篇》记载：“珠场寨距离白龙城水路三十里，距离调埠寨陆路三十里。”

按照古代行政机构设置的通例，行政机构驻地设在相同的行政区。合浦郡郡治设在合浦县，廉州府府治设在廉州，珠场巡检司机构驻地也同样是设在珠场寨。而这一时期的珠场巡检司不设在白龙城内，而是设在距离白龙城水路15千米的珠场寨，就行政辖区而言，应是在今南康镇内。由于珠场寨与珠场巡检司不是同一个级别的行政机构，而且驻地也是不固定的，因此，珠场巡检司在南康驻地的具体地点，除了珠场寨之外，还有其他哪些地方，这是有待考究的。

清康熙《廉州府志》记载，珠场巡检司负责川江寨、陇村寨、调埠寨、珠场寨、白沙寨、龙潭寨、武刀寨、古里寨等八个营寨的防务，此八寨古称“珠场八寨”，游击统兵防御寨以下设墩、台、汛，驻守兵员80余名。至清康熙元年（1662

年)改为水师营后,珠场巡检司一度随水师营移驻乾体港,珠场八寨划归水师营后,于清道光年间迁入北海老街。

珠场巡检司的职责除了保证珠池的安全之外,还兼有海防边塞的军务。司巡检的职务往往由州府的上一级主官直接管理。如清乾隆年间的两广总督杨应琚就直接向乾隆报奏,将合浦县珠场巡检司文武官弁改为“烟瘴要缺”。清光绪年间的两广总督谭钟麟就以“合浦县珠场司巡检张麟办事粗率,操守平常,均著即行革职,以肃官方”极奏。

《清实录·道光朝实录》中记载了一件时任两广总督琦善查处合浦县珠场司巡检的案件:“广东合浦县珠场司巡检蒋继炳,领解海关加平节存银三万四千二百两。查对勘合传牌相符,自系例应拨送。至其余搭解银四十鞘,究系何项银两?解交何处?若非例应拨送,何得擅索驿站夫车?该委员现在自己到京,著户部及步军统领衙门查明具奏。”经调查,内务府认为“该员行至涿州,托该州代雇车辆,付给价值。虽无擅索驿站情事,究属不合。请交部议处”。道光皇帝对此批示,从之。

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珠场巡检司的确是一个特殊的部门,官秩职级不高,职能级别却不低,能够负责押运 34200 两库银到京城,却又不能“擅索驿站夫车”,意思是说,巡检司没有调用沿途官方车船的权力。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就是这 34200 百两库银是从其他地方调来的,还是廉州府上缴的库银?如是廉州府上缴的库银,无怪乎清初顾祖禹在《读史方輿纪要》中称廉州“府南滨大海,西距交趾,同两粤之藩篱……珠官之富,盐池之饶,雄于南服”。

这就是珠场巡检司留给南康的精彩岁月与历史悬案。

一个传说说南康

明清之际,笔记小说兴起,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一股主流。由于这种笔记小说记事广泛,短小精悍,大多与民间流传的民情风俗紧密相关,所以流传很快,传播极广,对保存、收藏民间的历史典故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后世有评论者将史志、野史、笔记小说统称为“三大史籍资料”。这些笔记小说中也记载有众多关于北海合浦的典故,《咫闻录》中记述的《改恶报》,就是其中之一:

廉州合浦南康墟有宰豕为生者，曰于临宰时，见豕之畏就刀斧，大声呼号，心起不忍，恒欲弃而不为，然一家八口，舍此无以为养，强而止之。

迨后子已成童，令学别技，得藉糊口，即辍业，茹素诵经。闻雷声起，每食必辍箸漱口，跪诵雷经，俟雷息声而止，如是者八九年，未尝稍懈。

一日早起，正出门，忽邻居老妇向屠手招，似有事相告，屠乃过去，无人焉。但见旁舍母豕产畜，啧啧喁喁，正欲呼老妇而问以何事，顿时头眩目黑，仆跌于地，觉魂入于小豕之腹，欲言不能。思此乃杀生害命之报，转世为豕，从何解救？因想世俗念经可以消灾，于是默念雷经四十九回，忽闻雷电交加，霹雳一声，将豕身击毙而魂转于身。老妇惊而出视，曰：“彘已产矣，邻屠何睡于阶也？”呼之不应，老妇曰：“顷被轰雷击死乎？胡不为击死于其家而击死于予庭乎？”亟呼其家人至，方大哭间，屠已苏而起，询其故，备悉前由。老妇曰：“子何时来，吾并未招子也。”无不骇异，此嘉庆四年事，今已阅二十年。

近有自廉州来者述其事，知屠白发苍苍，犹存于世，于此可证天道之昭昭矣。其初之手招者，非老妇乃母彘也，其魂之转胎为彘者，瘳其屠豕之恶也。屠默理经而感动伏雷者，彰其从善之心也。兹延寿于耄耋者，取其洗心革面也。过则勿惮改，诚至圣之格言欤。

《咫闻录》是清代比较流行的笔记小说之一。作者自署“慵讷居士”，生平不详，根据《自序》及书中的记述，应是浙江人，曾游历各地，定居广州。《咫闻录》共有12卷，共收录作品247篇，除个别篇目外，大部分都是记叙怪异之事，情节单纯，语言简洁，用词古朴，讲究文学性，但收录最多的是讲因果报应的故事。以作者自序中所述，是受到《山海经》的启发，想通过这类故事劝告人们弃恶从善，知错能改。《改恶报》正是表达了这样一种创作意图。

《咫闻录》成书的时间是清道光九年（1829年），作者是在清嘉庆四年（1799年）收录这一故事的。也就是说，这个发生在南康的弃恶从善的故事早在清嘉庆年间就在广州传播开了。到了清道光、咸丰年间，曾任温州知府的梁恭辰（福建福州人），编著了笔记体小说《北东堂笔记》一书，又把《改恶报》编入书中，传播也就更广了。

一首诗歌说南康

1962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著名的戏曲作家、电影编剧、文艺批评家、文艺活动家，中国现代戏剧三大奠基人之一，时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田汉，到白龙城旧址参观访问，写下《访珍珠养殖场》一诗：

双鲨传说守杨梅，贯月奇光去复回。

北海开池初结果，南康剖蚌半含胎。

看来子好因娘好，毕竟他培赛自培。

玉润星圆千百斛，南珠应夺亚洲魁。

田汉盛赞南珠“玉润星圆千百斛，南珠应夺亚洲魁”的诗句被广泛引用传诵，成为当代描述北海南珠的经典诗句。然而，其中“北海开池初结果，南康剖蚌半含胎”的描述却被大多数的引用者和读者忽略了，而这句诗正好记述了北海发展人工养殖天然海水南珠历程的一个历史见证片段：北海的古珠池正当开始采珠时节，南康人工养殖的天然海水珍珠也迎来了令人喜悦的收获期，一半以上的珠贝里面，都孕育有“玉润星圆”的南珠。田汉对此丰收景象，由衷地发出了“看来子好因娘好，毕竟他培赛自培”的赞叹。那时，正是自1958年北海人工养殖天然海水珍珠获得成功，北海南珠养殖进入大发展的阶段。而南康就是最早开展人工养殖天然海水珍珠，建立珍珠养殖场的乡镇（时称公社）之一。

据记载，1958年8月15日，合浦珍珠养殖场开始马氏珠母贝的人工育苗试验，当时采用竹片或竹尾、珠贝壳、旧海箔等物作为珠苗附着基，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式，分别在海中安放附着基做试验。一种是附着基垂下安放，另一种是附着基平面安放。经过90天的检查，发现有无数的似芝麻般的幼苗群集合在附着基上的阴面，附着密度为每约3厘米长、0.7厘米宽的竹片上分布的贝苗就有20~60个之多。这一次试验先后采到了300万个马氏珠母贝苗。采集合浦马氏珠母贝苗的成功，预示了南珠产业生产发展的美好前景。

1958年11月，合浦建立了婆围公社珍珠场。与此同时，山口、白沙、南康、营盘等公社的珍珠养殖场也相继建立，其中营盘公社先后共建立了大小珍珠养殖

场 11 个。合浦各珍珠场共采集合浦马氏珠母贝苗达 446 万个。同年，合浦白龙珍珠养殖试验场改名为合浦专区白龙珍珠养殖场。

1959 年 2 月 7 日，合浦专区白龙珍珠养殖场改名为湛江地区珍珠养殖场。是年，合浦县又在山口、白沙、党江、西场等公社增建 4 个珍珠养殖场。

1960 年 4 月 25 日，鉴于营盘珍珠养殖获得成功，上年放养的 4.7 万个珠贝进行人工插核放养试验效果良好，沙田、福成公社也开始了珍珠养殖。合浦县委水产部向县委提出，在西场、总江、营盘、沙田、福成等公社建立珍珠养殖场，扩大海水养殖珍珠面积，加快南珠产业发展。

1962 年 6 月 9 日，合浦县水产局在向上级部门递交的《关于保护养殖珍珠的意见报告》中提出：不得到营盘的婆围、白龙一带的海域捕捞珠蚌作肉食；在这一带捕获的珍珠蚌，要由珍珠场收购放养；加强市场管理，严禁珍珠蚌在市场上出售。

1963 年 1 月 1 日，合浦县委为了发展珍珠产业，决定由合浦县水产局接收营盘婆围珍珠场为县、社合办的珍珠场，名为“合浦县珍珠场”。

1963 年 2 月 3 日，湛江专署水产局行文，严禁到白龙珠池及周边海域采捞马氏珠母贝。同年 8 月 19 日广东省水产厅发布《保护珍珠贝条例征求意见稿》，禁止私自到珠池海域捕捞珠母贝。

以上资料可以让人真切地体会到，田汉为什么特别在诗中强调“北海开池初结果，南康剖蚌半含胎”。因为他确实看到了当时南康公社在北海发展人工养殖天然海水珍珠中，作为第一批先行者所取得的成果及由此产生的示范带动作用。

古埠物产说南康

南康的石头埠在历史上就是一个重要的海运码头，是北海先民走向大海的起点之一。

不知道是在哪一个朝代，从哪里来的一群人，来到了大廉港海湾一带谋生，他们筚路蓝缕，在这里建立家园，从很远的地方背来了石头，一块一块地在海湾边上垒砌起码头，使此地成为出海打鱼的船只停泊避风的船埠。随着聚居人群的增加，渔农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船埠的功能也随之增加。渔家捕获的

海产品，农家耕种的五谷杂粮，还有生活日用品的交换，都聚集在这里，因此就需要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估计那一块块祖辈们用来垒成码头的石头，就是最贴切的名词，于是就有了“石头埠”这个土里土气却实实在在的地名。

有了基本的生产生活设施，聚居在石头埠周边的人群逐渐多了起来。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石头埠的先民除了出海捕鱼、摸螺采珠之外，又学会了利用海水煮盐。于是，一个新的产业从传统渔农耕作中产生了，石头埠开始有了盐业生产经营，并逐渐成为当地居民主要的营生行业之一。石头埠作为最早的盐业生产地之一，除了产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盐务功能，就是盐产品的海路中转运输。这一功能的形成，是由古代北海的盐业生产及储运环境所决定的。

南北朝齐政权时期（479年-502年），齐政权划合浦郡一部设盐田郡，盐田郡的郡治，据《壮族通史》的考证是在今北海市区东南。而民国版《合浦县志》则称，南齐年间，合浦一带便有了煮海水制盐的生产。因此设盐田郡，管理盐民，征收盐税。《大清一统志》的注称是，盐田郡疑即五代的盐场县，在今合浦东南界。从上述引证中可知，在南北朝时期，北海的盐业生产已有了一定的规模，不然的话，朝廷不会专设盐田郡。同时，就上述引证的区域方位来看，盐田郡包括了南康、营盘、福成在内。古代以地方特产设置行政区是常见的，如合浦在三国时曾设珠官县，唐增设珠池县，南汉时曾设媚川都（取“水怀珠而川媚”之意），都是以特产定区域名的，盐田郡的设置，见证了北海古代产盐的历史。

唐宋之际，为了配合盐务运输管理的需要，朝廷加强了大廉港的开发建设，在公馆修建了盐田，还修筑了大廉港至石康盐仓的运盐驿道，设置了大廉驿站，开辟了雷（州）廉（州）古道。明崇祯《廉州府志》记载，朝廷在大廉村建有“白石驿”，在牛角田村设有公馆，作为官府传递文书、管理盐运物资的中转站及办事机构。而由大廉港到石康盐仓的运输线路主要是以海路为主，即白沙、福成、营盘、南康沿海一带生产的海盐，都是通过海路运到公馆或闸口的榕根港之后，再通过人力肩挑背扛，走运盐驿道将盐送到石康盐仓。朝廷为了盐运的需要，加强了大廉港的开发，修建了大廉运盐驿道，为廉盐盐务管理提供运输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包括石头埠在内地区的盐业生产发展。

由于古代盐业生产的规模不大，盐灶分散，各地煮、晒出来的海盐，要有一个中转储运点。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石头埠码头是白沙、福成、营盘、南康沿海一带修建较早、使用时间较长的码头，此处的航线也最成熟，因此成为担当中转储运任务的最佳选择。白沙、福成、营盘、南康生产的小批量海盐，就这样经过石头埠集中储存成批后，再运到公馆盐务管理机构“白石驿”，调运至石康盐仓。

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朝廷在合浦设立了白石场盐署，加强了盐运的管理。清嘉庆至道光年间，朝廷对廉盐生产的控制更严，多次行文严惩私盐，确保廉盐进入湖南市场。至民国初年，合山、钦州、灵山、防城的所有盐场并入合浦白石场署统一管理，共有大岗、竹林、公馆、平山、石头埠、犀牛脚、江平、企沙、乌泥、车板（今属广东廉江市）、榄子根等12个盐场，所产的盐由场署统一分配各埠销售。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出版的《南路实业调查团报告书》记载，白石场有石头埠、犀牛脚、榄子根、白沙、江平、公馆、竹林、乌泥、平山、大岗、车板（今属广东廉江市）等分场，每年约产盐1.5万吨。

新中国成立后，盐田全部收归国家所有，由盐工组织互助经营。1954年成立了盐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8月，石头埠、榄子根、闸南、竹林等9个盐业生产合作社转为地方国营充美盐场和竹林盐场。1959年9月竹林盐场场部从福成竹林迁到南康石头埠，改名为“石头埠盐场”。1961年9月，石头埠盐场场部又迁到婆围公社田寮大队北暮村，易名为“北暮盐场”。北暮盐场盐田分布在南康、营盘两个乡镇长达15千米的海滩上，场部设在南康镇北暮村南端，最高年产量出现在1981年，达2.15万吨。1977年被轻工部授予“全国大庆式企业”称号。曾经作为合浦四大支柱产业之一的海盐产业，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消退了，但是石头埠盐场（北暮盐场）的荣耀，永远存留在南康的史册中，闪烁着岁月的光华。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初，一队全副武装的绿营兵乘船前往铁山港石头埠，他们是奉两广总督谭钟麟之命，前来石头埠巡查的，主要任务是“隐抵法舰窥伺”。原来，在此之前，法国军舰开抵冠头岭海面后，曾悄然驶进铁山港“窥伺”，法国军舰要“窥伺”什么呢？就是石头埠的煤矿。法国人利用“永州

教案”要挟清政府获取北海铁路建设权失败后，又提出要“合办”石头埠煤矿。为此，谭钟麟一边奏报朝廷，一边命令廉州府立即招聘200名工人，采取人工采煤的办法先行开矿，“以绝法人覬觐”。于是就有了清朝水师和法国军舰先后进入铁山港石头埠的场面。北海的采矿工业就是在这样的刀光剑影中诞生的。

石头埠煤矿的勘探规划早在清光绪初年（1875年）就开始了，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广东郑姓商人开始建设煤矿。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御史钟德祥派员到石头埠实地勘探后，于同年九月上奏朝廷称“煤质甚佳”，建议朝廷采取免厘减税的办法开展招商合作开采。钟德祥的建议得到朝廷的批准。随即，又由商人合股对石头埠煤矿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探。据当时北海海关税务司二等帮办田三德描述，石头埠煤矿还请“洋师为之督工，刻已挖得油煤、石煤两种，闻说煤质尚佳，经由外洋运机器到埠”。就在建设北海石头埠煤矿一切按部就班之际，法国人横插一脚，为了“以绝法人覬觐”，时任两广总督除了命令廉州府用人工开采之外，还报请朝廷拨银7万两，把石头埠煤矿改为官办。然而仓促之间，许多技术问题未能解决，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石头埠煤矿只好停办。到了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石头埠煤矿改为商人合股，重新开工建设，并扩挖第二个井巷，还派人去香港购办新机器，可惜的是，这次挖出的煤炭“煤质量脆”且又不能燃烧。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经过了6年的坎坷之后，这个“按照外国水平建设”的石头埠煤矿终于在内忧外患中关闭了。

邂逅虎踪说南康

“平坡遇大虫”（北海合浦的方言称老虎为“大虫”），这在北海合浦的民谣中指碰到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在北海合浦这样平坦的南流江冲积平原沿海地带，遇到老虎的机会是极少的。但古时候的北海合浦地区，确实有老虎存在，并且还不是个别现象。

《北海杂录》一书记载：“在北海的外国人，间亦有到附近村落猎虎，是年腊月，有德国人在南康地方猎虎一头，重约二百余斤。”

《北海杂录》的作者梁鸿勋，广东三水人。从该书自序可知，《北海杂录》的编写，是与“其间之贤士大夫及巨商长老。谈次，凡天时、地势、商务、风俗、

农业、渔业、土产、矿产诸端，靡不咨诹，有所得，辄手笔录之，细大不捐，积凡若干页”。因此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史料，这是十分难得的。书中记述“德国人在南康地方猎虎一头，重约二百余斤”应该是真实的。

书中还提到“在北海的外国人，间亦有到附近村落猎虎”，这也是有事实依据的。据《粤南日报》报道，合浦县从清光绪六年（1880年）至二十二年（1896年），虎患持续了17年。廉州在广东全境有虎患记载的14个州府中排第三。而合浦古属的上八团（今浦北，旧称上八团）、公馆以及南康、福成一带，都有老虎出没的踪迹。

而在南康一带亲身遭遇了虎踪的杜臻，则另有一番惊险的经历。

杜臻，字肇余，浙江秀水（即今嘉兴）人，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任翰林院编修，后任秘书院侍读。此后历任河南乡试正考官、国子监司业、翰林院侍读学士和内阁学士，礼部、吏部、刑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工部尚书、刑部尚书、礼部尚书、兵部尚书，有“四部尚书”之称。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军平定台湾，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向清政府投降，大清江山由此一统，海宇安宁。清政府正式下令开放已禁闭20余年的海外贸易，并撤销迁界令。为了考察广东和福建沿海地区的疆域民生与海防建设情况，康熙命时任工部尚书的杜臻与内阁学士石柱为钦差大臣，巡视粤闽沿海边界。这次巡视启程时间为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农历十一月至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农历五月，前后历时半年。巡视人员除了杜臻、石柱两位钦差之外，还有两广总督吴兴祚及广东巡抚李士楨。

杜臻是在完成了廉州府城的巡视事务之后，于当年农历二月初一前往白龙城的。在前往白龙城的途中，他还专程到上窑村的官办窑场视察。上窑村窑场建于明代，以工场所在的村名“上窑”为名。上窑是朝廷指定的陶瓷生产基地，这里因在明嘉靖年间曾生产陶瓷烟斗而闻名。杜臻时任工部尚书，地方的工业生产当然是巡视重点。

考察了上窑工场之后，杜臻又赶往白龙城考察军务。由于天色已晚，不便入城，只好在城外搭起帐篷露宿，没有想到这竟是一个惊魂之夜。

是夜，杜臻在帐篷里听到了外面有异常的声音。当他披衣起来走出帐篷察看时，看到的居然是一只大老虎。这只老虎正走到马槽边，窥视着马匹，伺机对马匹发起攻击。马匹也许过于疲倦，正在打瞌睡，没有发现危机。而旁边猪圈里的猪却先看到了老虎，由此惊恐起来，跳出猪圈逃命。这样正撞上了虎口，做了替死鬼。这只老虎拖走了肥猪之后，再也顾不上杜臻，杜臻因此得以脱身而有惊无险。杜臻后来在《粤闽巡视纪略》中这样记述当时情形：“二月丁酉朔行四十里至上窑，又三十里至白龙城。明时采珠内监所驻也，有城四门，内官署及巡道署废址犹存于城之东隅，皆荡为墟莽，城亦倾坏。是夕宿于野，四无人居，张幄以寝。夜分有物至帐外，勃窣作声。披帷视之，庞然巨虎也，方睨枥上，朦朦未觉，圈豕先见之，惊啼跃出，虎啣之而去。”杜臻夜宿白龙城外遇虎的经历，为廉州府“平坡遇大虫”存留了考证史实。

夜袭白龙城的这只老虎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以当时的地理环境条件来看，白龙城西侧是古时候福成河的入海口，在当时是一个主要的港口，港口河岸边又建有上窑（明代）和下窑（宋代），这里是繁忙的陶瓷生产工场，而福成河又把白龙城及其以西地区隔开了。这只老虎不太可能是从合浦青山岭至老虎岭一带渡海而来的。白龙城外虽有杨梅岭，但这里是渔家祭祀海神珠神的地方，香烛鞭炮不断，这只老虎也不太可能在这里潜伏。想来是南康一带的丘陵坡地，当时处于未开发的状态，且又与闸口山区相邻，林草茂密，适合老虎的生存活动，给了老虎日伏夜袭的便利。

南康江畔说南康

干流全长 31 千米的南康江，发源于石康镇沙路口村东，一路南流，流经南康圩，至营盘青山头奔向大海，形成的流域面积有 181 平方千米，中游宽 20~40 米，下游出海口为喇叭状，涨潮时宽度约 1 千米。南康江入海口位于营盘镇青山头，为了防范海潮与江水合流造成的水患，1971 年这里动工修建了青山头海堤围。青山头海堤围由 34 个小堤围连成，1983 年经过合并修建后，堤围总长度 1.45 千米，总面积达 21.2 平方千米，堤顶高 7 米，宽 5 米。围内耕地面积 9.2 平方千米，人口 1500 人。

江流奔腾，海水平阔，林带环绕，田如棋盘，渔歌唱晚，海鸥翱翔，南康江就这样承载着南康人的期待与梦想，汇入北部湾，陪伴着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航船走向世界，迎来了新世纪大发展的时代洪流。

南康江两岸，地势较平坦，适宜种植甘蔗、花生、木薯等旱作物。耕地面积61.82平方千米，其中水田24.23平方千米，旱田、坡地共37.59平方千米，有林面积57.78平方千米。南康人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甘蔗种植。据史料记载，早在清乾隆年间，南康就有了制糖业。1976年国家投资520万元，兴建了南康糖厂，南康由此成为北海主要的蔗糖基地。南康糖厂有过骄人的业绩，曾经生产混合糖2.22万吨，为南康人的甜蜜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南康在历史上又是合浦重要的陶瓷生产基地之一。清道光年间，合浦的陶瓷产业以南康为龙头。到了清同治年间，南康的陶瓷生产集结在赤江，主要以生产缸、煲、盆、钵、粗瓷碗等陶器为主。清末，南康的赤江已形成6条陶窑和1条碗窑，共有工人200余人，年产陶器、瓷器20余万件，产品销售到雷州半岛和海南岛。民国十年（1921年），南康商人在赤江组织了同益公司，包购包销当地陶瓷产品。南康江满载着南康出产的陶瓷产品，远销至海南等地，赤江的陶器产品曾一度供不应求。新中国成立后，合浦的陶瓷生产仍以南康地区为主。1955年，赤江共有陶器厂24间，其中公私合营厂1间，私营企业23间。1972年，国营赤江陶器厂的陶瓷产品达27.12万件。1978年，赤江陶器厂转为区属华侨系统县级企业，主要产品有陶器、炻瓷和工业建筑锦砖三大类。赤江陶瓷厂生产的各种产品远销美、英、法等19个国家和地区。南康无愧于“陶瓷之乡”的美誉。

红色传统说南康

南康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革命老区，南康的下塘村、雷田村、扫管龙村、龙门村是自治区核定的革命老区村。从抗日战争时期起，这些革命老区村就是革命的堡垒村庄。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合浦党的地下组织在南康开展革命活动的村庄共有20余个。因此，南康在北海的革命斗争史册中，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一）抗日武装起义

1945年2月3日晚上7时半左右，在中共南康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人陈符隆、

张义生的领导指挥下，中共南康党的地下组织全体党员及进步青年约40人，武装袭击了位于南康三中附小的粤南沿海警备第二大队第四中队驻地，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经过了几十分钟的战斗后，缴获步枪9支，子弹9箱及重机枪1挺。起义队伍中的张义生等3人牺牲。这就是合浦第二次抗日武装起义中的南康起义，打响了合浦乃至钦廉四属举行全面武装起义的第一枪。

战斗结束后，起义的队伍按照事先的部署，避开了国民党地方武装的重重围追堵截，分批进入白石水抗日武装根据地。

1945年2月5日，在钦廉四属党的联络员阮明同志主持下，把南康、公馆、白沙、白石水等地起义的武装人员，并编为合浦人民抗日大队。同年2月11日，南路抗日人民解放军高雷二支队，由参谋长李筱峯、支队长黄景文和张世聪率领，从廉化挺进合浦到达金街根据地。12日，在金街小学操场上，召开与合浦人民抗日大队会师大会，会后合并成合浦抗日人民解放军第三支队。

1947年初，合浦人民抗日大队发展成为合东南游击大队，约有100余人枪，轻机枪2挺。大队长朱伟，副大队长李成，政委钟古，文化教员姚国厚。大队下辖2个中队。同年6月初，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二十四团成立，合东南游击大队编入二十四团，成为该团的七连和八连。七连连长廖明，指导员杨勉，副连长周洪英；八连连长邓振松，指导员钟景彰，副连长邹锦秀（后任连长）。

（二）革命摇篮合浦三中

1940年4月，合浦三中（今南康中学）的张家保、许维芳、廖世华等三名党员，建立第一届党支部，张家保任支书，成员有许维芳、廖世华。当时国民党推行反共政策，7月，学校将张家保解聘。张家保被迫离开了合浦三中，转到灵山工作。8月，合浦三中第二届党支部成立，李洵祥任支部书记。由于合浦三中党支部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为避免遭到迫害，李洵祥于1941年3月撤离学校，调往其他地区工作。留下的党员由钟古（钟喜权）负责联系。1942年春在陈符隆同志主持下，在雷田小学组建合浦三中第三届党支部，钟古任支部书记，后改为单线联系。合浦三中第三届党支部是在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后成立的，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下坚持斗争，做了大量工作。

一是掌握学生会和各班班会，利用这些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利用各种纪念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利用节假日组织同学开展宣传，在圩日到街上或下乡宣传，大唱抗战歌曲，唤起同学们的抗日救国热情。同时，党支部发动、组织进步学生开展各种学习活动，团结教育同学，关心国家大事，有时还召开时事讨论会，请进步教师龙德珍在周会或节日大会上做形势报告。报告结束后，以班为单位组织同学自由参加讨论。党支部以这样的形式团结教育同学，使他们免受学校反动当局的蒙骗。

二是以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策为主要内容，广泛地组织进步学生利用漫画、墙报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主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破坏团结抗日的罪行。

三是发起捐献活动，支援白石水的抗日武装斗争。党支部除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宣传外，还指导学生会组织支援白石水斗争的游艺晚会，在晚会上详细介绍白石水人民反奸抗日的真相，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支持和包庇奸商运米资敌、镇压人民的罪行，号召学生和人民群众捐献钱、物（衣服、药品），解决白石水人民的困难。

四是团结进步教师，组织秘密读书会、读书小组学习进步书籍、报刊，进行时事学习、讨论，使大家认清形势，增强革命信心，使进步学生一直保持一定的数量。党支部还在学校开展反对在学校组织反动三青团的活动。党支部于三青团在学校发展之前，就组织开展揭露三青团组织的反动本质的活动，使大多数学生懂得三青团是反动组织而加以抵制。

五是积极发展党员，对党员进行教育，增强党员的党性。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形势险恶，学校气氛紧张，有3人先后退党。针对这种情况，党支部在党员中加强形势教育和理论学习，提高思想认识，使党员的思想稳定下来，同时注意发展新生力量。1941年9月至1942年4月，先后发展蔡标、邓治、王昌锐等同志入党，使党支部的力量得到补充和加强。至此，合浦三中的党员有钟古、姚善智、叶达山、李杰惠、唐邦昌、廖尚莲、谢惠昌等。同时还确定了一批入党对象，他们是邓其雄、钟逢适、姚宁泽、王鸿昌、劳世璉、陈铺信、姚凤厚、

蔡联宽等。

1943年7月，钟古和其他党员全部在合浦三中毕业，离开了学校，合浦三中第三届党支部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合浦三中党组织在革命战争年代里，为北海的革命事业培养输送了大批新生力量。这些新生力量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合浦三中因此被称为“革命的摇篮”。



南康中学（原合浦三中）高中楼

孙益辉摄

（三）抗日女烈士杜振蓉

杜振蓉，北海南康人。读书时就接触了党的地下组织，因此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以教书掩护，积极开展革命工作。后与中共钦廉四属联络员兼军事特派员阮明相识并结婚。

1945年1月，中共南路特委决定，在钦廉四属地区举行抗日武装起义，阮明被任命为钦廉地区武装起义总指挥。阮明在合浦县白石水地区大成（今浦北）成立了钦廉地区武装起义指挥部后，立即日夜兼程赶往四属各地传达特委指示，部署钦廉四属的武装起义工作，杜振蓉也跟随在阮明身边配合工作。在阮明的出色领导下，钦廉四属的武装起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在短时间内，阮明连续成功地发动了5次武装起义，而且一次比一次声势浩大，于是各地军警民团不惜一切代价搜捕阮明夫妇。

2月13日，阮明夫妇深入灵山等地检查了武装起义情况，布置好起义队伍转移路线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合浦，前去检查发动合浦西片的武装起义情况。2

月16日，阮明夫妇在赶往白石水大成指挥中心途中，不幸遭遇敌人而被捕，随即被押解往灵山县城，囚于郊外仙龙亭监狱。国民党当局逮捕了阮明夫妇后，立即采取各种手段严刑拷打，逼供劝降。当时，杜振蓉已怀有身孕，国民党当局竟然以此作为威胁，妄图逼迫阮明夫妇就范。面对国民党当局的凶残无耻，阮明夫妇始终坚贞不屈。国民党当局无可奈何，在使尽手段折磨了阮明夫妇34天之后，于3月20日晚上，偷偷地将阮明夫妇押至灵山先农坛前残忍杀害，连杜振蓉腹中的婴儿也不放过，牺牲时阮明年仅25岁，杜振蓉仅22岁。

（四）英勇转战太行山的谢潼关

谢潼关原名谢有干，生于1919年农历四月十八，南康镇黄稍村人。

谢潼关小时候在黄稍读初小，后在南康三中附小读高小。1932年秋考入广东省立廉州中学，读了三年初中。就读于廉州中学时，在进步同学杜渐蓬、何世权、何承蔚的影响和帮助下，与同班同学周崇和（即罗文洪）一起参加学生进步团体“艺宫学术研究会”的活动，阅读进步书报，参加救亡活动，开始接受和学习马列主义通俗读物。

1935年秋，谢潼关考入广州八桂中学，直至毕业。在校期间，他经常到生活书店、上海杂志公司阅读进步书刊和通俗的马列主义著作，以及毛主席《论持久战》等，思想上受到启发和教育，为追求真理、走向革命、到陕北加入中国共产党打下了思想基础。



游击队宿营地旧址 苦相杰 摄

西安事变后，谢潼关在中山大学党的地下组织的影响下，参与组织读书会，

在校开展救亡活动和学联工作。抗日战争开始后，参与组织“八桂农村服务团”办墙报，宣传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为八路军募捐防毒面具。1938年6月高中毕业后经广州八路军办事处面试后，被介绍到陕北公学关中分校二区队第四队学习，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陕北公学毕业后，由组织安排到中央青委办的安吴青训班速记班学习。1939年5月调到中央书记处、秘书科工作，参加速记记录中央领导同志报告，如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

1939年，谢潼关响应党中央号召，跟随罗瑞卿、成仿吾率领的抗大总校、华北联大（编号为八路军第五纵队）挺进华北敌后太行山，时任中央教导队三排排长，继而经组织分配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材料科工作，曾参加《材料汇编》的编辑工作，被选为机关党支部委员、党小组长。

1940年，谢潼关参加百团大战关家垴战斗。1942年5月任林北县委宣传部部长。1943年冬，参加太行五地委整风班整风。至1945年日寇投降，谢潼关先后调任太行山地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磁县县委宣传部部长兼任豫北战役磁县支前指挥部政委。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谢潼关基本上是在延安和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度过的。

解放战争时期，谢潼关参加平汉战役（即邯郸战役）豫北战役的后勤工作。1947年，从太行山跟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任“天池”部队五队三排排长。在皖西桐城、潜山、怀宁三县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参与大别山根据地重建，经受了严峻考验。历任潜怀县委副书记，潜山县委书记、县大队政委，渡江支前指挥部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谢潼关历任安庆地委委员、地委农委书记、地委宣传部部长。1954年10月调任中共合肥市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兼监委书记，1956年夏到1957年夏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一年。

1959年8月至1977年，谢潼关先后任马鞍山市委常委，马钢公司副经理，马鞍山市副市长、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统战部部长及市政协副主席，安徽省马钢建设指挥部党组副书记、副指挥，马鞍山钢铁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

兼纪委书记。1982年冬，经冶金部批准离休。

谢潼关离休后成为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顾问、中国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革命纪念馆专业委员会顾问、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革命纪念馆专业委员会名誉会长、马鞍山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谢潼关的著作有《毛主席欢送我们上前线》《战斗在天柱山上》《忆延安》《重返延安》《挺进华北敌后》《读彭德怀自述》《陈毅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等。

（五）革命老村扫管龙

南康扫管龙村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老区村。早在中共北海党组织建立的前期，该村就有一批青年加入革命队伍和党组织。之后，该村革命青年受党组织的委派，冒着生命危险离开家乡，分别深入闸口、营盘、福成等地乡村开展建立地下党组织，发动革命武装斗争等工作。为了掩护党的地下组织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该村的革命群众大都自动自觉地成为革命堡垒户，在村中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交通情报站——战马站，为抗日救亡活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扫管龙村的革命群众在党的地下组织的发动带领下，先后参加了合浦县第一、第二次抗日武装起义。该村是武装起义部队集结、隐蔽活动的主要村庄之一。

1945年2月，合浦县第二次抗日武装起义后，为了避免敌伪军队的围剿扫荡，南康武装起义的部队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化整为零成立武工队，扫管龙村是成立武工队的驻点村庄。1946年2月，南康武工队在这里发起的“扫管龙战斗”，缴获了国民党江门自卫大队的1挺轻机枪和10余支步枪，壮大了武工队的实力。在此期间，武工队还收编了一支30多人的“绿林”武装加入革命队伍。

1947年春，在敌人轮番扫荡的形势下，南康武工队先后分3批撤往公馆、白沙隐蔽，只留下钟景彰、李克等10余人组成的武工队，坚持在扫管龙一带开展斗争。后来，这支武工队开往六湖垌大旺山，编入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团。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扫管龙村先后有20余名热血青年参加了革命武装队伍：他们之中，有1949年任乾江乡人民政府乡长的姚让厚，为巩固新中国

的人民政权光荣牺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新中国成立后，有姚克鲁曾任广西政协副主席，姚胎汉曾任北海市副市长，姚歧厚曾任北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宁泽曾任合浦县政协主席，姚国厚曾任广东省阳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再立新功。

1952年扫管龙村曾为合浦县第六区扫管龙乡政府机关驻地；1953年属南康区；1958年改大队，属南康公社；1984年改村，属南康镇；1994年属铁山港区；现为北海市革命老区村。

为了继承和弘扬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和道德风范，由村里的老同志牵头，发起倡议，经全村群众一致通过，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北海（合浦）党的地下组织交通情报站——战马站旧址建立“扫管龙革命老区村村史陈列馆暨爱国主义教育点”。扫管龙村建立“扫管龙革命老区村村史陈列馆暨爱国主义教育点”得到了当年曾在扫管龙村工作的老同志的热心支持，他们不但积极地为村史陈列馆提供史料及人文线索，还到扫管龙村现场指导筹建工作。北海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的有关人员也多次到现场给予指导。



扫管龙村革命老区村村史陈列馆

苦相杰 摄

2015年春节前夕，北海首个“革命老区村村史陈列馆暨爱国主义教育点”扫管龙村革命老区村村史陈列馆在铁山港区南康镇扫管龙村建立，为扫管龙村的春节增添了喜庆红火的气氛。村民们聚集在陈列馆里，认真浏览村里的革命史迹墙

报，共同缅怀革命先辈，激发了浓浓的爱乡情怀的同时，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习近平主席强调的“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等重要指示精神，这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意义。